

## 【中国思想史】

## 李二曲的真儒论和儒学适用论

蔡德贵

(山东大学《文史哲》编辑部, 山东 济南 250100)

**摘要:**李二曲是关学中的重要成员,他对儒学进行的条分缕析,在今天仍有意义。他强调做儒要做真儒,儒的价值在于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应用,不能应用的儒学,对社会是无益的。

**关键词:**李二曲;真儒;儒学实用论

**中图分类号:**B244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2731(2002)01-0054-03

关学是儒学中的重要一派,具有明显的独尊儒术特征。对此,笔者已在《关学的独尊儒术特征》一文中详论过,兹不赘述。李二曲是关学晚期的主要学者,其思想有代表性。简要来说,他的思想突出两方面内容:真儒论和儒学适用论。

李二曲对儒学可以说是条分缕析,层层剥离,最后强调做儒要做真儒。在他看来,儒家绝不是铁板一块,而是可分的。从大处来看,儒宗、儒教、儒林,是指儒学整体而言的。什么是儒?李二曲的解释是:“儒”字从“人”从“需”,言为人所需也。道德为人所需,则式其仪范,振聋觉聩,朗人心之长夜;经济为人所需,则赖其匡定,拯弱亨屯,翊世运于熙隆;二者为宇宙之元气,生人之命脉,乃所必需,而一日不可无焉者也[1](P450)。但从道德和经济两方面来看,前者为体,后者为用,“道德而不见之经济,则有体无用,迂阔而远于事情;经济而不本于道德,则有用而无体,苟且而杂乎功利”,因此仅有一方面,就不能算做儒,起码不能算做“全儒”。他反对“各居一偏,终非全儒”之“儒”,而提倡“道德经济备而后为全儒”。在另一个地方,他又说:“德合三才之谓儒。天之德主于发育万物,地之德主于资生万物,土顶天履地而为人,贵有以经纶万物。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,则与天地生育之德合矣,命之曰儒,不亦宜乎!”所以,“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,务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”[1](P120)。

但是,从现实社会层面来看,人们并不这样要

求。所以,凡是读儒书,言儒言,冠儒冠者,都算“置身于儒林”,“以儒自命”[1](P450)。这样就使“儒”的范围相当宽泛。从时间方面来分,有“昔儒”、“今儒”、“后儒”;从褒义方面来分,有“大儒”、“巨儒”、“业儒”、“世儒”、“宿儒”、“吾儒”、“全儒”、“名儒”、“君子儒”、“高儒”、“真儒”;从贬义方面来分,有“俗儒”、“腐儒”、“霸儒”、“小儒”、“小人儒”、“应付儒”;不一而足。李二曲要人们做“真儒”和“君子儒”。

真儒与君子儒是同类概念,应付儒与小人儒是同类概念。它们之间的区别是:一为大而通,一为拘而滞;一为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,一为反是;一为喻于义,一为喻于利;一为实心实行,一为色取行违……[1](P450)李二曲指出儒家有自己的异端:儒外的异端,儒内的异端,都对儒家造成危害,而内部的异端危害更大。他指出,孔子对异端别然有感,故曰“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”,孔子时的异端就是“乡愿”。战国时的异端,有告子、许行、庄周、邹衍、邓析、公孙龙子,而杨朱、墨翟的“为我”、“兼爱”“尤为世所宗尚”。汉唐以来的异端,有托老子行世的魏伯阳的仙术、张道陵的符篆,而佛教五宗密布,禅宗盛行,自然也是异端。对儒外的这些异端,虽然“其危害何可胜言”,但程朱辟之,“人始晓然于是非邪正之归”,“不至生心害政”。生心害政的是儒中的异端:“盖吾儒之学,其端肇自孔子,思孟阐释,程朱表章,载之《四书》备矣,无非欲人全其固有之良,成已成物,济世安民也。……否则止以

收稿日期:2001-03-18

作者简介:蔡德贵(1945-),男,山东招远人,山东大学《文史哲》编辑部教授,主要研究东方哲学、中国哲学。

荣肥为计,其发端起念,迥异乎此,与《四书》所载,判然不同,非吾儒中之异端而何?”这种异端“生于其心,害于其事,发于其事,害于其政”,甚于洪水猛兽,其害“深而难距”[1](P436)。

李二曲提倡“真儒”要“明体适用”。他说:“穷理致知,反之于内,则识心悟性,实修实证;达之于外,则开物成务,康济群生。夫是之谓‘明体适用’。明体适用,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,学焉而昧乎此,即失其所以为人矣!明体而不适用,便是腐儒;适用而不明于体,便是霸儒;既不明体,又不适用,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,便是异端。”[1](P120)所以,“明体适用,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,学而不如此,则失其所以为学,便失其所以为人矣”[1](P401)。可见,体,指的是明道存心,明体,就是在道德修养上下工夫;用,指的是经世宰物,适用,就是在治国平天下的具体事务上下工夫。所以,不管是明体也罢,适用也罢,都突出了儒学的实用性。但在道德为体方面,古今儒家的主张并不一致,“或以主敬穷理标宗,或以先立乎大标宗,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,或以自然标宗,或以复性标宗,或以致良知标宗,或以随处体认标宗”,虽然有区别,但在他看来,“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,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”[1](P3)。

在李二曲看来,悔过自新的理论基础是人人都有良心。良心,也称灵原、天良、心。他认为,人“形骸有少壮,有老有死,而此一点灵原,无少无壮,无老无死,塞天地,贯古今,无须臾之或息”,“人人具有此灵原,良知良能,随感而应”[1](P18)。“良知即良心也”[1](P128),“夫天良之为天良,非他,即各人心中一念独知之微,天之所以与我者”[1](P144),人为学的目的,就是要发明这种良心,所以他说:“论学于今日,不专在穷深极微、高谈性命,只要全其羞恶之良,不失此一点耻心耳。不失此耻心,斯心为真心,人为真人,学为真学,道德、经济咸本于心,一真自无所不真,犹水有源,木有根;耻心若失,则心非真心,心一不真,则人为假人,学为假学,道德、经济不本于心,一假自无所不假,犹水无源,木无根。”[1](P491)悔过自新就是要使此心澄洁,这也就是修身的目的所在:“修身当自‘悔过自新’始,察之念虑之微,验之事为之著,改其前非,断其后续,使人欲化为天理,斯身心皎洁。”[1](P407)

为使悔过自新顺利进行,李二曲提出了一系列方法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:一为立志。“立志,当做天地间第一项事,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人,当为前古后今着力担当这一条大担子,自奋自力”[1](P46)。李

二曲认为立志最根本的是脱俗,“大凡立志,先贵脱乎流俗。是故行谊脱乎流俗,则为名人;议论脱乎流俗,则为名言。果能摆脱流俗,自然不埋于俗、安于俗。而不思脱俗者,斯其人固已惑矣;欲脱俗而又欲见信于俗,则其惑也不亦甚乎?”[1](P119~120)脱俗就要矫正时弊,其门人王心敬在《南行述》中记载:

一友谓:“世路崎岖,日趋日下,奈何?”曰:“世路固日趋日下,而自己跟脚,则不可不坚定,中立不倚,毫无变塞,方为强哉能矫。否则,人趋亦趋,随俗浮沉,见粉华靡丽而悦,遇声色货利而移,如是,则虽日日讲道德,谈性命,不过口头圣贤,纸上道学,其可耻为何如耶!”[1](P76)

有了这种脱俗之心,就能“处富贵如无与,处贫贱如无缺,处患难如无事,随遇而安,悠然自得”,“否则胸次扰扰,心为境转”[1](P421),就不能正确处理争、欲和谤的问题。对于争,李二曲认为,“世人事多,多起于争”,“文人争名,细人争利,勇夫争功,艺人争能,强者争胜”,“无往不争,则无往非病”,因此要改变这种争的现实,君子做到“学不近名,居不谋利,谦以自牧,恬退不伐”,有什么可争的?“惟是见义争为,见不善争改”[1](P439)。对于欲,他认为,“人惟有欲则不刚,不刚则不能直内而方外,故圣贤之学,以无欲为主,以寡欲为功”,因为“龙为有欲,则为人制;人为有欲,则为物屈”[1](P447)。所以,他主张“日用之间,以寡欲正心为主,以不愧天为本。欲不止乎声色货利,凡名心、胜心、矜心、执心、人我心,皆欲也。寡而又寡,自念虑之萌,以至言动之著,务纳乎天理,无一毫夹杂,方始不愧于天”[1](P137)。对于谤,他主张“凡毁誉之来,听其自然,一以空豁旷达之字处之”,因为“宾实之名,虽经千谤而不坠;无根之誉,虽强护持而必涸。”在他看来,“宾实之名,譬如佳木植于芳苑,经风雨而弥茂;无根之誉,譬如翦采缀于宫树,历时日而随败”。所以对于谤的正确认识,应该是“谤之来也,有真有伪,我有是而人谤之,方将修省痛改之不暇,乌容置辩;我无是而人谤之,则惟任其自起自灭,付之罔闻而已,又何必置辩?”[1](P141)正因为如此,脱俗就成了立志的第一要务。

二为慎独。有学生向李二曲请教何为慎独,他回答说:“子且勿求知‘慎’,先要知‘独’;‘独’明而后‘慎’可得而言矣。”在他看来,“凡有对便非独,独则无对,即各人一念之灵明是也”[1](P35)。慎独是悔过自新的重要一步,“须整顿精神,中常惺惺,一言一动,并须体察。必使言无妄发,行无妄动。暗室屋漏,一如大庭广众之中,表里精粗,无一或苟。明可以对

人对天,幽可以质鬼质神”[1](P46)。慎独是需要“实实体认”的硬功夫,只有靠长期的静坐,才能养成习惯。所以,李二曲说:“水澄则珠自现,心澄则性自朗。故必以静坐为基,三炷为程,斋戒为功夫,虚明寂定为本面。静而虚明寂定,是谓‘未发之中’,动而虚明寂定,是谓‘中节之和’。时时反观,时时体验。一时如此,便是一时的圣人;一日如此,便是一日的圣人;一月如此,便是一月的圣人;终其身常常如此,缉熙不断,则全是圣人,与天为一矣。”[1](P21)

在道德修养方面,李二曲同样重视实行。他要求人们做到“念念切己自反,以改过为入门,自新为实际”[1](P114)。阅读儒家经典,要时时考虑“与自己身心有无交涉,务要体之于心,验之于行。苟一言一行不归诸此,是谓侮圣言,空自弃”[1](P116)。所以他明确说:“我这里重实行,不重见闻;论人品,不论材艺。”因为“多闻多识,不见之实行以蓄德,人品不足,而材艺过人,徒擅美炫长,无补于世”[1](P136)。为此,他反对纸上道学,指出“人生吃紧要务,全在明己心,见己性,了切己大事。诚了大事,焉用著述?如其为也,何贵著述?”“口头圣贤,纸上道学,乃学人通病”[1](P158)。“作口头圣贤,纸上道学,因循犹豫,以老其身,呼吸一去,千古无我,抱憾何及,可惜孰甚”[1](P230)。他赞成尚行,反对尚言,指出“古人尚行,故羞涩其言而不敢轻出;今人尚言,故鼓掉其舌而一味徒言。若果学务躬修,自然沉潜静默,慎而又慎,到讷讷然不能出口时,才是大进;否则纵议论高妙超世,总是顽不知耻,总是没学问,没涵养”[1](P441)。对儒家经典,要身体力行,心口如一,“只心口一不相应,正人君子早已窥其中之不诚而恶之矣”[1](P445)。只会背诵儒家经典,而不会应用,于世无补,“(儒家经典)乃万古不易之常经,日用常行,而不可违焉者也。吾人口诵而身违,书自书,我自我,是谓叛经;讲了又讲,解了又解,徒夸精斗奥,借以标名,是谓侮经”[1](P531)。

在实行方面,在上者更为重要。因为“天下之治

乱,由人心之邪正;人心之邪正,由学术之明晦;学术之明晦,由当事之好尚”,“上之所好,下即成俗,感应之机,捷于影响”[1](P105)。所以正人心,首要的是正君心。“好恶不公,由君心不清;君心之所以不清,声色、宴饮、珍奇、禽兽、宫室、嬖幸、游逸为之也。君若以二帝、三王自期,以度越后世庸主自奋,以建极作则,治登上理为事,自无此等嗜好而心清;心清斯好恶公,好恶一公,则理财、用人事事皆公,与天下同其好恶而合乎天下人之心”[1](P411)。

为了使儒家学说能得到真正贯彻执行,李二曲写过一部《儒鉴》,目的在“俾儒冠儒服者,有所考镜,知所从事,念非切己急务,遂辍不复为”[1](P155),因为在他看来,这是维护儒学的正统所必须的,“士既业儒,则儒不可以无鉴。镜以照面,则面之净垢见;鉴以观儒,则儒之得失见。见净垢,斯知去垢以求净;见得失,斯知舍失以求得”。“儒惟无鉴,以故业儒者无所惩劝,学术不明,人才不兴”[1](P199)。但可惜,这部《儒鉴》没有流传下来。

以上内容,都属于儒学适用论。而李二曲的明体适用论,还包括有许多经济实用之学,涉及到农业、水利、人口、地理等方面的内容。他甚至非常具体地谈到大兴农田水利的方案,对西北地区泾、沮、清河、石川诸河的治理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这些看法是否正确,现在已无评论的必要。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对“实行”的重视,这在今天看来,是特别有意义的。在这里,我想重复一下几年前在《实用儒学浅谈》中提出的一个观点:建构实用儒学,尽快促进儒学的实用化。学者们对儒学是否有利于现代化、是否有利于市场经济,争论不可谓不多。再争论下去,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我建议有关部门,组织一下全国的儒学研究力量,认认真真地从儒学中挖掘出有利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内容,把这些内容组织成系统的著作,以平民能接受的语言、风格,把儒学的精华介绍出来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[1] 李二曲,二曲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6.

[责任编辑 徐怀东]

## The Authentic Confucian Theory and Applied Confucianism of Li Erqu

CAI De-gui

(Journal of Literature, History and Philosophy, Shandong University, Jinan Shandong 250100, China)

**Abstract:** Li Erqu is a major member of the "Guan School". His thorough analysis of Confucianism still has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 world.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n authentic Confucian instead of a hypocrite. The true value of Confucianism is for it to be applied in the society and inapplicable confucianism has no use for the society.

**Key words:** Li Erqu; Authentic Confucian; Applied Confucianism